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第 11 期（总第 419 期）

2024 年 11 月 5 日

-
- ◆ 以数字技术引领农业农村创新发展……………黄季焜（1）
 - ◆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孔祥智（4）
 - ◆ 共同富裕践行者 乡村振兴实干人 ……马志祥（7）
 - ◆ 生态学的源头在哪里……………郭书田（10）
 - ◆ 从“一刀切”到“切三刀”——“大包干”政策进程（3）……………赵树凯（14）
 - ◆ 退休后，我们以“五微”建设乡村 ……朱启臻（19）
 - ◆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和“双引擎” ……游 斌（21）
 - ◆ 乡村振兴：亟待整饬的短板硬伤与对策……………王金世（23）
 - ◆ 七校学者联合调研“种地”课题……………明海英（27）
 - ◆ “弱资源村”的文化振兴该从何入手……………毛晓雅 杨钰莹（29）

以数字技术引领农业农村创新发展

黄季焜

发展数字经济，加快经济社会转型，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已成为全球共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对数字技术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作出了具体部署，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并就深入推进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治理与服务数字化等工作提出了要求。为加快数字技术与农业农村各领域的深度融合，近年来国家先后出台系列政策文件，使数字乡村建设在短短的几年内由战略构想、方案规划迈入试点实施与在部分地区全面推进的新阶段。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数字乡村战略”，201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就明确了数字乡村发展的重点任务，2020年全国启动了一批数字乡村国家试点县（市、区）、多个省市也积极探索实施省级数字乡村试点。

随着我国数字经济的加速发展，数字技术必将在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加快数字技术的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生产力，优化城乡与区域要素流动和配置，缩小城乡差距；以数字技术引领农业农村创新发展，有助于推进农业高质高效，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加快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等各领域应用，能大幅提升乡村社会治理能力和公共服务效益。

数字技术推进乡村振兴和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在于乡村数字基础设施

乡村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物质条件，为乡村产业数字化、乡村治理数字化和乡村生活数字化等提供基础设施支撑。加快乡村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和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提升和拓展乡村产业、乡村治理、公共服务、城乡消费等尤为重要。信息、金融、商业、农产品终端服务平台、基础数据资源体系等方面是当前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内容。

为促进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实施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工程”。文件要求在前期建设基础上“推动农村千兆光网、第五代移动通信（5G）、移动物联网与城市同步规划建设”，这对广大农村的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据化将起到加速的作用；为发展智慧农业，提出“建立农业农村大数据体系，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深度融合。完善农业气象综合监测网络，提升农业气象灾害防范能力”；为了进一步提升数字技术的普惠性，文件还特别提出通过“完善电信普遍服务补偿机制，支持农村及偏远地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加快建设农业农村遥感卫星等天基设施”推进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在农业生产中的应用。

近期北京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联合阿里研究院发布的《县域数字乡村指数》研究报告（以下简称“北大研究报告”）综合采用政府统计数据、行业数据和互联网大数据，对全国1880个县或县级市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进行评价。研究表明，虽然县域乡村数字基础设施近几年来得到了较快发展，

但差异较大，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处于高、较高、中等、较低和低水平的县（市）数量比例分别为 30%、51%、11%、6%和 2%。整体上，县域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发展呈现东部和中部发展较快、东北和西部地区发展较慢的分布格局；同时，研究还发现，全国县域农业农村基础数据资源体系的建设较为滞后。

为此，在加快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一方面，需要着力推动以 5G 网络、物联网、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协同推进乡村农产品终端服务平台、商业和金融等方面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进农业农村遥感卫星等天基设施建设，构建完善的农村基础数据资源体系，加快提升以大数据驱动乡村生产经营管理和服务体系现代化的应用水平。另一方面，也要特别关注中西部地区或欠发达地区的乡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从数字化人才、项目资金、技术支持等层面加强对农村尤其是偏远和相对贫困地区农村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

数字技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乡村产业数字化

乡村产业数字化是数字乡村建设的核心，是实现乡村经济快速、包容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数字技术对乡村生产、供应链管理、营销、金融等全产业链的数字化转型发展将发挥重要的驱动作用。推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等产业全面深度融合，将成为打造科技农业、智慧农业和品牌农业的重要途径。推动数字技术嵌入供应链管理的全过程，有助于整合和优化供应链中的信息流、物流、资金流，实现高效率低成本的生产与销售、提高经济效益。加快数字技术融入商业活动和金融服务的诸多环节，有助于促进商业和金融服务流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重塑农村商业模式和发展格局、深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创新。

为加快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中央一号文件突出强化科技支撑、加快智能化农业机械研发和应用，“发展智慧农业”；强调“加快完善县乡村三级农村物流体系，深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和农产品出村进城”，同时还指出要“完善农村生活性服务业支持政策，发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网点，推动便利化、精细化、品质化发展，满足农村居民消费升级需要”；在强化现代农业科技和物质装备支撑领域，要求“提高农机装备自主研发能力，支持高端智能、丘陵山区农机装备研发制造”；在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方面，提出“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园和科技示范园区建设。把农业现代化示范区作为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在强化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投入保障方面，强调“要支持市县构建域内共享的涉农信用信息数据库，用 3 年时间基本建成比较完善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信用体系。发展农村数字普惠金融”。

近期发布的北大研究报告指出，虽然我国县域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有所提高，但从整体上看发展还刚刚起步，这也意味着未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和潜力。例如，县域乡村产业数字化处于高、较高、中等、较低和低水平的县（市）比例分别为 0.2%、3.2%、51.7%、40.3% 和 4.6%，是推进数字乡村建设的重要短板。同时，研究也发现，县域乡村产业数字化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发展水平从高到低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

为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相关政策，需要持续加强国家数字农业农村创新工程建设，大力完善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种业等的数字化和智能化建设，鼓励发展数字新业态新模式。深化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全面打通线上线下营销通道，加快数字化供应链创新。强化关键技术装备创新、推动技术集成应用与示范、加快农业人工智能研发应用。推进区块链、物联网、大数据技术在农村征信体系建设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中的创新性应用。

数字技术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是乡村治理数字化

乡村治理数字化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也是建设数字政府、高效服务乡村的重要保障。推进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在乡村治理和公共服务领域的广泛应用，加快平台化、组件化工具的普及，有助于推进乡村治理模式创新，构建多元主体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数字治理新格局，不断提升乡村治理决策科学化、精准化及公共服务高效化水平。

为加快补足乡村数字治理领域的短板，中央一号文件在加强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特别强调要“加强乡村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建设”。在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方面，提出要“加快发展面向乡村的网络教育”。在深入推进农村改革方面，要求“加强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和管理信息网络平台建设，提供综合性交易服务。加快农业综合行政执法信息化建设”。

数字技术在推进我国乡村治理数字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近年来在部分发达地区取得较大进展，但相较于数字乡村其他领域，乡村治理数字化发展水平还相对较低。北大研究报告显示，县域乡村治理数字化处在高、较高、中等、较低和低水平的县（市）比例分别为 6.6%、14.5%、33.1%、27.6%和 18.2%；东部和中部地区发展较快，东北和西部地区发展滞后。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实施将对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和服务水平起重要的促进作用。但要大幅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服务水平，一方面需要深入探索乡村治理数字化和提升治理与服务能力的体制机制，另一方面需要加快村级智慧化治理工具和平台的创新与应用，深入推动数字技术向乡村治理各服务领域广泛延伸，提高村级综合服务信息化水平，优化乡村现代化治理和服务体系。

（作者：《中国乡村发现》学术委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江西农业大学乡村振兴战略研究院院长。来源：中国农村网）

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

孔祥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这是建设农业强国和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基础，是党的“三农”政策的基石。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坚持党的农村政策，首要的就是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根据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精神，在新时代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要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

《决定》指出：有序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试点，深化承包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改革，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根基。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指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怎样在农户和集体的土地承包关系上体现“长久不变”？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2018年12月修改的农村土地承包法也体现了这一精神。2019年11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发布，指出：“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使农村土地承包关系从第一轮承包开始保持稳定长达七十五年，是实行‘长久不变’的重大举措。”要求现有承包地在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由农户继续承包，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以各地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为起点计算；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应坚持延包原则，不得将承包地打乱重分，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从目前已经到期或即将到期地区的情况看，大都按照中央文件精神坚持延包原则，有的利用村集体的机动地或者集体资产对无地农民进行适当补偿，基本保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武汉农村综合产权交易所时提出，“要好好研究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者之间的关系”。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顺应农民保留土地承包权、流转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把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分为承包权和经营权，实现承包权和经营权分置并行，这是我国农村改革的又一次重大创新。”2016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意见》，对“三权分置”的基本原则和实施问题作出了具体规定。“三权分置”改革要结合二轮延包一并推进，对于很多地方出现的“小田并大田”、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实践，要结合现行法律、政策的规定，在确保农户土地承包权的前提下有序推进。

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推进要以前述两项重大政策为基本依据。改革开放40多年来，在种植业中广大农民创造了三种适度规模经营形式：一是土地规模化，即通过土地流转，提高经营面积实现规模经营。二是服务规模化，即通过社会化服务实现规模经营。截至2023年，超过107万个组织开展农业社会化

服务，服务面积超过 19.7 亿亩次，服务小农户 9100 多万户。三是微型家庭农场，即那些不需要流转土地，仅在自己的承包地上通过集约经营就可以实现较高收入的农户，如山东寿光的菜农、陕西洛川的果农等，这些农户通过资金、技术投入提高集约经营水平，从而获取较高收入，他们对国家重要农产品（水果、蔬菜等）的稳产保供贡献很大。当然，这类农户也需要资金、技术、市场等方面的服务，也属于服务规模化覆盖的范围。可见，对于规模经营中的“规模”，要从土地、服务、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理解，而不能仅仅理解为土地规模。

《决定》指出：完善农业经营体系，完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促进农民合作经营，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指出，加快构建以农户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与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2018 年 9 月 2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突出抓好农民合作社和家庭农场两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赋予双层经营体制新的内涵，不断提高农业经营效率。”完善农业经营体系，必须大力发展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一是促进农村土地经营权向家庭农场和农民合作社等经营主体流转。当前全国土地流转面积中，转入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的相对较少，转入普通农户的较多。转入普通农户的一般为亲朋之间的代耕代种，流转价格较低；而转入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的一般在流转平台上交易，价格较高。要按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完善承包地经营权流转价格形成机制，使流转价格逐渐回归市场，由市场来决定，促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发展。这样，转入普通农户的土地也可能更多地转到家庭农场和合作社等主体，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同时要提升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小农户的带动能力，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

二是大力促进农民合作经营。截至 2024 年 3 月底，全国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达 219.7 万家，带动了全国约 50% 的农户，但单个合作社的规模较小，发挥作用有限。因此，在政策上，要促进农民合作社之间的联合与合作，鼓励同一地区的同业合作社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再合作，组成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在更大的范围内联结农户、影响市场。同时，构建合作社与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增强经营水平，提升带动小农户能力。各级政府对于农民合作社的优惠政策要与其带动小农户水平直接挂钩，其中，税收优惠政策要与其成员交易量（额）直接挂钩，不是与成员的交易量（额）不能享受税收优惠。

三是健全便捷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迅速、成效显著。2013 年，农业部、财政部实施农业生产托管试点；2014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发展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竞争充分的社会化服务，推行合作式、订单式、托管式等服务模式，扩大农业生产全程社会化服务试点范围。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支持具有资质的经营性服务组织从事农业公益性服务。”在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上走出了关键一步，调动了公益性、经营性服务主体的积极性。2017 年，农业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三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多元化多层次多类型的农业生产性服务，推动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带动更多农户进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全面推进现代农业建设，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托管的发展。当前，我国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农业生产对托管服务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缺口较大，还要提供政策引导更多主体进入农业生产服务领域。

《决定》指出：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2016年12月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通过改革，逐步构建归属清晰、权能完整、流转顺畅、保护严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保护和发展农民作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发展新型集体经济。”截至2021年底，全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阶段性任务基本完成，农村集体家底基本摸清，65.5亿亩集体土地资源、9.14万亿元集体资产上了“户口”，确认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约9亿人，登记赋码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约96万个。2021年全国村集体经济组织总收入6684.9亿元，村均122.2万元，其中经营收益5万元以上的村占总村数的59.2%，为推动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改革不是目的，而是要用好改革成果，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一是构建产权关系明晰、治理架构科学、经营方式稳健、收益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其核心就是使改革以后形成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在产权关系明晰的前提下，构建科学的治理架构，即现代企业制度的治理架构。第一，改革后建立的经济合作社或股份经济合作社都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要与村“两委”职责分明，合作社理事长可以由村党支部书记兼任，但党务、村务和合作社事务不能混在一起，要独立运作。第二，对于一些城郊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于资产较多，个别村可达数亿甚至数十亿元，一般会组建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在法理上，合作社作为出资人对资本负责，公司对经营绩效负责，从而实现“经营方式稳健”的要求。第三，合作社或公司均可聘任职业经理人负责业务经营。

二是充分利用农村集体自身资源条件、经营能力，探索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多样化途径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从全国情况看，绝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资金、资源、资产有限，很难达到正常经营需要的最小规模，或者即使达到最小经营规模，也要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对于土地、滩涂、水面等资源采取发包的方式让合作社或者家庭农场经营，办公用房、商住用房等主要采取出租的方式经营，资金、资产主要应入股到业绩良好的企业或农民合作社，让专业人员来办专业的事。所谓“居间服务”是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利用资源条件和经营能力，为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联结农户、促进土地连片等服务，从而获取一定的“居间”报酬。从实践看，在这方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大有可为。总之，发展集体经济必须尊重群众意愿、遵循市场规律，不能走“归大堆”的老路子。

三是构建科学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目的就是提高成员收入水平，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富裕。改革的方式是股份量化到人，一些地方把村集体所有的非经营性资产（如办公用房、校舍等）也都进行了量化，在此基础上的收益分配也应该以股份为基础准则，这是改革的题中应有之义。但事实上，仍有一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沿袭原来的福利化分配方式，即年终分一些食品、给老年人发一些补贴等，这些情况要予以避免，加以纠正。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来源：中国农村网）**

共同富裕践行者 乡村振兴实干人

马志祥

马志祥，现任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长安镇前进村党委书记、甘肃前进现代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2001年以来，先后获得“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农业科教兴村杰出带头人”“全国农村扶贫导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十佳农民”“甘肃省最美人物”“感动甘肃·陇人娇子”等荣誉称号。自担任前进村党支部书记以来，马志祥紧紧围绕“抓党建促经济”总体思路，不断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实施能人治村引路、狠抓项目建设带动，通过“党支部引领+村民参与+合作社推进+公司主导”的村办集体经济模式引领，带领前进人走上了一条多元发展、共同致富的发展道路。2023年全村经济总收入达16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达5万元。

依农富农谋出路 守土有责立初心

前进村位于张大公路1.5公里处，全村现有7个社，385户1560人。村内现有党员89人，村党委下设农村党支部、企业党支部共计22个支部。现有耕地1860亩，人均耕地1.25亩。2001年之前，该村主要以粮食种植和零散养殖业为主，经济效益较差，群众一直处在“种粮穷，穷种粮”的怪圈，致富无门、增收无方、致富无领头人。外出经商多年的前进村人马志祥回到家乡，看着家乡落后的面貌，萌生了带领父老乡亲共同富裕的想法，面对自有企业蒸蒸日上与贫困落后的家乡现状，经过慎重考虑，最终决定牺牲自我“小富”带领大家“共富”。作为致富能人，在当年换届选举中，他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从进入村“两委”班子那一天起，他就深深地感受到肩上的压力。要带领1600多口人奋斗，肩上的使命和责任使他不敢有丝毫懈怠。他虚心拜离任村干部为师，从处理村民家庭矛盾小事入手，到谋划全村产业发展的大事，事无巨细，通过实景课堂看、敲门上炕学、现场开会悟等方式不断汲取新知识。最终，他凭借着学不会不罢休、干不完不收工的劲头，很快进入了角色。在他的带领下，前进村“两委”班子成员多方考察论证，并结合前进村村郊优势，确定了发展设施农业、致力增收致富的路子。2001年前进村成立了全区第一个专业经济组织——长绿蔬菜协会，主要从事本村及周边村镇的蔬菜种植、收购、销售及技术服务指导，为带动本村农户增收致富发挥了重要作用。为了做大做强蔬菜产业链条，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他又带领村“两委”班子四处考察、多方招商引资，于2005年招商引资1200万元，建成3200吨的嘉禾公司蔬菜预冷保鲜恒温库。为确保露地蔬菜种植面积，马志祥动员村“两委”分组包户搞动员，全面发动党员带头搞种植，经过支部引领、党员带头，群众放下焦虑参与到露地蔬菜种植行列，前进村顺利完成了由日光温室向露地蔬菜种植的产业链条打造，共累计发展订单蔬菜1.2万亩，年产值达1.2亿元，群众人均增收突破千元，前进村产业发展实现了第一次完美转型跨越。

跳出农业做农业 转型升级守初心

随着设施蔬菜农户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竞争力越来越强，利润逐年下降，而且受耕地面积所

限，前进村除了城郊优势外，已经没有任何其他优势可言。面对这样的现状，马志祥准确把握形势，因势利导提出“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发展思路，决定独辟蹊径，跳出农业做农业，确定了立足城郊优势发展葡萄产业，把单一农业做成现代精品产业的富民强村思路。按照组织搭台、群众参与模式，发展红提葡萄等特色精品果蔬产业，走生态、绿色、有机、协调发展之路，实现了前进村设施农业向精品农业的转型跨越。马志祥抢抓黑河流域综合治理工程实施的机遇，争取高效节水项目资金 260 万元，面对项目资金已到位、差额资金无处寻的难点问题，他带领前进村班子成员和党员积极争当引领致富“宣传员”，他们反复动员村社干部、退伍军人、广大群众融资入股，参与到精品果蔬产业发展中来，通过班子成员引导、党员带头示范，最终发动了群众参与筹款，实现了大家抱团发展。农户自筹 100 万元资金到位后，540 亩设施红提葡萄基地迅速建成，定植优质红提葡萄 6 万株，聘请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做技术服务，全面打响了“前进村红提葡萄”品牌，果蔬品牌效应不断提升作物价值，每亩红提葡萄产值达到 10000 元以上，亩产值比原来提高了 2000-3000 元，大大提高了农民收入，也更加得到了群众认可和信任，前进村通过栽植红提葡萄实现了进入致富“快车道”，人均收入再创新高，前进村产业发展实现了第二次转型升级。

致力村民同富裕 多元发展铸初心

在全村人民率先过上好日子、村级各项事业蓬勃发展的大好形势下，提出了发展永无止境、改革永无止境、增收永无止境思路。2008 年“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中国奶业陷入寒冬。他却从中发现了商机，决心要建“甘肃最大的奶牛场”，养“最好的奶牛”，产“最好的奶”。牛场创办初期，在大家害怕担风险不敢参与时，他以带头尝鲜的勇气第一个融资入股合作社进行引领示范。同时，他还争当引领致富“宣传员”，行走在忙碌播种的“埂上”，围坐在激烈讨论的“炕上”，蹲守在考虑农户的“门上”，不分白天黑夜，无畏冷嘲热讽，深入开展宣传工作，反复动员村社干部、党员、退伍军人融资入股，参与到合作社发展中来。通过他的带头示范和不懈努力，实现了大家抱团发展，最终走上了共同富裕的产业富民道路。经过十余年发展，他同村党组织一班人硬是把一个仅有千头奶牛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成为全国排名 12，拥有员工 1500 余人，存栏奶牛 5.2 万多头，资产总额 35 亿元，下属养殖场 19 个，日产高品质鲜奶 800 吨，自有饲草基地 10 万亩，拥有日运输能力 600 吨的东风旗舰冷链运输车 100 余辆、日生产能力 150 吨和 500 吨的乳品厂各 1 座，日处理鲜奶 2000 吨的乳类产品精深加工厂在兰州新区建成投产，年处理能力 50 万吨的有机肥场 1 座、年生产能力 10 万吨的饲料厂 1 座。产品远销陕西、四川、广东、贵州、福建等地，与四川菊乐、贵阳三联、重庆天友、广东燕塘、深圳晨光等知名乳企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是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甘肃省奶业协会会长单位、中国优质奶源基地。

履行责任显担当 砥砺奋进践初心

前进村在马志祥的倡议下，坚持为本村 60 岁以上老人每月发放 100 至 1000 元的生活补贴，并为老人和 12 岁以下的儿童每天免费供应半斤鲜奶。把每年 8 月 29 号定为前进村村民“爱村日”，每年拿出 600 万元奖励在村集体事业发展中做出贡献的优秀党员、致富标兵、产业能人，形成了争当先进的良好风气。每年投入 30 多万元培训经费，组织“两委”班子成员和产业带头人到发达地区考察学习，每月定期举办劳动力技能培训班，累计培育“土专家”“田秀才”近 200 名，全村劳动力人均掌握了 2 门以上的致富技能，回请 10 多名务工经商人员回乡创业，为人才发挥作用、能人创业致富搭建了实践平台，

全村各个主导产业上的致富带头人由 10 多个人激增到了 200 多人，有力推进农民知识化进程。建立奖学激励机制，在“爱村日”设立大学生鼓励奖，对考上大学的学生给予 3000-5000 元不等的表彰奖励，激发了学生学习向上的热情，支持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同时，在马志祥的带领下，前进村毅然扛起社会责任，开展了系列脱贫帮困工作。为张掖市甘州区 152 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每户配股 2 万元，每年按照配股资金 10% 的红利分红，优先吸纳贫困户就业，带动贫困户种植青贮饲草创收，设立前进牧业扶贫专项资金，提升了贫困家庭造血功能。2018 年，积极响应省委、省政府精准扶贫号召，马志祥决定由前进牧业出资 6000 万元，在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东乡县建设 3000 头规模肉牛养殖基地，带动东乡县 2689 户贫困户通过肉牛养殖脱贫致富。通过多年发展，前进村形成了红提葡萄、奶牛养殖、设施农业、果蔬产业、现代乳业为主题的五大特色优势主导产业，切实把农民群众从一家一户单打独斗的“小舞台”，推向了抱团发展共同致富的“大天地”。前进村集体经济不断积累，村民人均收入阶梯式增长，村级发展的后劲更加充足，村民的思想视野进一步开拓、物质生活进一步改善，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持续攀升。前进村先后获得“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经济组织试点单位”、财政部“科普惠农先进单位”“全省农村基层组织建设五个好村党组织”“党建工作示范村”等 20 多项荣誉。在为村级争取荣誉的同时，马志祥仍在这个平凡而有意义的岗位上为他心心念念的“同富”初心努力耕耘，用实干姿态书写着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壮丽篇章。

（作者：甘肃省张掖市甘州区长安镇前进村党委书记、甘肃前进现代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来源：《中国村庄》杂志第 9 期）

生态学的源头在哪里

郭书田

生态环境问题是全球性问题，在中国更为突出。自 1992 年巴西首脑会议开展以来，在全球推行可持续发展战略有成效，局部有所改善，整体仍在恶化。近些年来，由于加大改善能源结构力度，我国碳排放量有所降低但仍居首位，所以还需要努力实现零排放奋斗目标！

我记得曾在科学院任职的石山老先生见到钱学森后讲了一句令人印象极为深刻的话：不按规定办事，不论谁当领导，都是瞎指挥！

许滌新老先生在他主持的生态经济学会上说：规律有两个，一个是经济规律，一个是自然规律。当双方发生碰撞与矛盾时，经济规律应服从自然规律！科学院马世骏听了后说：我是研究生态的，但此话不敢说，你是经济学家敢讲此话，很了不起！

一、生态学创始人不是德国法克尔。近日我查了生态学创始人，是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于 1866 年提出生态学的概念，主要是研究人与周围环境的关系（ECOLOGY），被誉为生态学之父，一直流传至今。国际上对老子的天人合一思想，虽有所赞扬，但缺乏实质研究。最近北京举行第六届国际佛学论坛，尚未见研究道学会议。国人把中国文化排序为儒——释——道，这是传统的说法，道说是老子创立的，唐代曾把道教立为国教！

但老子的哲学思想——唯物辩证法比费尔巴哈与黑格尔早很多个世纪，他的生态学思想超过儒家。儒家因有汉代的董仲舒和宋代的朱熹，抬高到“唯儒独尊”的地位。“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是不适当的，但在改变儒家“霸主”地位还是有积极意义的。客观公正地评价老子的哲学思想与生态学思想，端正中国思想史消除偏颇，恢复他应有的学术地位是很必要的。

二、老子创立了“道学”。老子的生态哲学思想集中反映在《道德经》中第 25 章。原文为：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译文为：有一物浑然而成，在天地形成之前就已存在。听不到它的声音，也看不见它的形体，独立长存不停息，循环运行不衰竭，可以作为万物的母亲。我不知道它的名字，所以勉强把它叫做“道”，再勉强给它起个名字叫“大”。它广大无边而运行不息，运行不息而伸展遥远，伸展遥运而返回本源。所以说道大、天大、地大、人也大，宇宙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另在 42 章中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从此处可以看出 2500 年前老子的宇宙观与生态观的辩证法！不仅超越了当时的孔子，更远离了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得！

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于 1866 年提出生态学的概念 (ECOLOGY)，让人们重视对周围环境的保护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局限性很大，照此说当前气候变暖不是生态学研究范畴，岂不谬哉！把他说成是生态学创始人甚至说他是生态学之父，显然是不当的！

三、老子的“道法自然”思想。那么，老子的哲学观与生态观有什么关系呢。他说的人法地、地发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其中对“法”字如何理解十分重要。有的学者提出“法”是效法之意，含有学习的意思，因此可用学字表述；也有的认为“法”字含有爱护与保护的意思，可用护字表述；还有的认为“法”字含有尊重的意思，可用尊字表述。

天大、地大、道大、人亦大。即域内（有的认为是指宇宙，有的认为是指国家，空间很大）有四大。其中人亦大，包含两个层次，一是人民群众，二是王，也就是帝王及其官员。

道法自然，自然也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万物客体，二是指顺其自然自然，不要随意干预，也就是“无为而治”。

道大与天、地、人大三者关系。“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也就是说天、地、人及万物的母体是道，道是它们的母亲，也就是它们的根和源头。这样就好理解道的本质与内涵，它在与其他天地形成统一而又密切互相依存不会分离的系统中的地位与作用。也就是老子在《道德经》的开头语所言：道可道，非常道。

四、国内外历史知名人物对老子《道德经》的评说。一是国内。司马谈（西汉，司马迁之父）在《论六家要旨》中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蹈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

司马迁（《史记》著者）：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执，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无为物先，不为物后，故能为万物之主。有法无法，因时为共，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子钢也，群臣并至，使多明也。

王弼（晋哲学家）：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以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

朱元璋（明皇帝）：为哲学指导，在治理国家方面受益良多，称其为“圣人的教诲”。

毛泽东：《道德经》是一部兵书。

郭沫若：《道德经》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又是一部兵书。

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最高范畴是“道”，而“道”的观念是《老子》首先提出来的。

鲁迅：不学《老子》一书就不知道中国文化，不知人生真谛。

二是国外。爱因斯坦：我一直很推崇老子的道德经，他的智慧在于用极简单的语言表达了深刻的道理，如“无为而治”和“道法自然”。

托尔斯泰：老子所提倡的“无为而治”和“道法自然”，让人们更好地理解自然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关系。

黑格尔：道德经提供了最深刻并且较完善的生态智能，调和了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

尼采：老子思想集大成，具有现代意义。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如早些读到道德经，可能避免一些失误。

《道德经》已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在国外广泛发行传播，据联合国文教组织称，发行量在《圣经》

后第二位。它是中华文化之源，已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和发展老子的哲学思想与生态思想是我们义不容辞挑起的重担！

我在 2003 年“非典”期间不能外出，在家闭门读书，初读了《道德经》，有两句至理名言让我牢记不忘。一是“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二是“吾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这的确是天之道，是大道，千古不朽！

五、传承践行老子生态哲学的 4 位学者。

老子的哲学思想与生态思想产生于 2500 前，在人类思想库中是光辉的，是中华文化永不枯竭的源泉。相信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科学技术的进步，他的思想还会不断发出灿烂的光彩！

在改革开放以来，我有幸认识了 4 位当代的生物学家，是我亲密的良师益友，他们的科学实践和取得的丰硕成果，传承并践行了老子的哲学思想与生态思想，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一是林占熺。他是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是国家菌草研究中心主任。他创造了以草代木的菌草技术和菌草学。他培育了植株高大、枝叶繁茂的优良草种用以养殖灵芝菌，经过加工生产出多种优质增强免疫力的产品，远销国内外市场，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成为脱贫致富的技术，还改善了生态环境，颇受政府与农民的欢迎。而且已走出国门，在亚非许多国家引进这项技术获得成功！现在正在黄河全流域两岸建立菌草带。在此想起一个传说故事，秦始皇为了长生不老，派徐福前往今辽东半岛寻找灵芝，徐福带了童男童女前往今朝鲜半岛定居。这是神话故事，如今已成为现实！可以说这是“道法自然”在当今实践的一项成果。这项技术受到习近平主席的赞赏与支持。

二是任荣荣。他是中国林业科学院的资深研究员，经多年的研究，培育成功“饲料桑”树种，在各地非耕地的贫脊土地上生长良好，根系发达，叶片肥大，经加工后成为饼状饲料，供禽畜食用，节约粮食，蛋白质含量超过大豆，适应性与抗逆性强，不畏旱涝，沙荒地、盐地、水库消落地等都可种植，投入成本低，被中国工程院多名院士认可与支持，认为这是开启发展木本饲料少用粮食的新路！又能改善美化生态环境！目前已在全国各地种植 100 万亩以上，急需列入国民经济长期与年度计划。

三是那中元。他是云南农业大学毕业的，自办云南生态农业研究所任所长，家是祖传中医，受家族影响，根据中医理论，以中草药为原料，产生一种既能高产又能抵抗各种灾害的物种，经过多次反复种植试验，创造了名为“生物诱导剂”，不是农药，是促进物种变异的，他试验多次种植出能产生 100 多个变异种的小麦，曾送给《自然》杂志刊出，但利用的很少。上世纪 80 年代，我去昆明见到他，他对我说，滇池污染有治了，我很惊讶！他说，我先研究是怎么造成的，不是工业废水，而是引进的水葫芦与水浮莲，它们快速繁殖引发蓝藻腐烂，使水体变质。因此要从治蓝藻入手，喷入诱导剂杀死，运出经过处理，使其成为肥料，变废为宝，水也就变清了。我返京后立即向王郁昭（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认识他）汇报，以二人名义报国务院领导。此后与他多次接触，知道他用此法培育了小麦、玉米、大豆、水稻多种粮食作物，产量高、品质好、抗逆性强、成本低（不用或少用农药化肥）、效益好！今年黑龙江五常大米丰收，他是出了力的，目前仍奔波在各地农村！

四是孙鸿良。她是农科院作物所老研究员，一辈子与籽粒苋打交道，引进与培育多个优良品种在各地推广。它是苋科植物，是畜牧业的优质饲草，能在各种劣质土地生长，产量不低，适合贫困地区种植，容易推广，但由于收获后水分大不便运输，采取烘干办法解决！老大姐还在为此而在各地奔波！

六、学《道德经》感言。

《道德经》5000字，后人分段为81章，用多种文字流传世界许多国家。迄今有2500年的历史。它既是中国的文化遗产，又是世界的文化遗产。它是一部史学书，又是一部哲学书，还是一部文学书。可以说将社会科学中的文史哲三学融为一体而又能最简明的文字表述的是道学书。

自有人类以来，天地人三者是互为依存而又不能分割的命运共同体，是不可违背或逆转的自然规律，而且在自然界不断往复循环的运转，推动社会的进步发展。这是天之道也。背离或逆行了就要受到这个规律的惩罚！

人类社会在经历漫长的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发展，出现了背离自然规律而损害生态环境的严重问题，导致气候变暖，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举行的全球首脑会议，为改变这种局面，通过了实行可持续发展的《21世纪议程》，具有纲领性与里程碑的重大意义。李鹏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积极支持这个决议，并率先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受到赞赏。

从此中国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生态文明观，改变损害生态环境的思想和行为，走上可持续发展实现经济社会良性循环的大道。这可以说是传承与践行老子“道法自然”光辉思想的展示，也进一步说明老子思想的普世性与前瞻性。在这次为善待人类生存发展环境的“生态战”中，以老子思想为指导，总结实践经验，提升与丰富生态学理论，实现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

老子思想远在天边，历经2500年；近在眼前，俯首可见！

（以上供内部参阅，智量有限，错误难免，请予指正见鉴！）

（作者：原农业农村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原所长，高级经济师。2024年10月30日）

从“一刀切”到“切三刀”

——“大包干”政策进程（3）

赵树凯

“切三刀”：贫困地区、中间地区、发达地区

“切三刀”是当时农口部门流行说法。其政策含义是，落后地区、中间地区、先进地区实行三种不同类型生产责任制，即：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中间地区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发达地区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这个政策设计是农委副主任杜润生于1981年1月提出，中央办公厅批转下发。1982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发布，“切三刀”政策废止。

（一）“切三刀”政策表述

很多年来，农村改革决策回忆文章虽多，但对“切三刀”鲜有涉及。在本人看到的十几种相关著作中，只有《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和《风云万里》有所表述，但也极其简略。前者强调“切三刀”是杜润生、赵紫阳提出的“包产到户的折中方案”，后者表露了这个问题的敏感性。

1981年3月27日，中央办公厅批转下发杜润生《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中央办公厅在通知中说，是“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意见”转发，“希望各地结合自己的情况认真研究，并作为处理当前出现的一些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参考”。这个报告转发全党，标志“切三刀”政策意见正式出台。基本内容是：

其一，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困难地区实行包产到户稳定几年，大有好处。类似兰考、东明这样的贫困地区，全国大约有一亿五千万人口。退到包产到户，搞它三五年，使这里的社队转变穷困面貌，使每个农民平均收入达到一百元上下（集体收入和家庭收入），并减轻国家每年返销几十亿斤粮食的负担，是完全可能的。包产到户，特别是包干到户这种形式，虽然带有个体经营性质，但由于它是处在社会主义经济条件下，不同于历史上封建社会时期的小农经济，今后一个时期还会有相当大的生产潜力可以发挥，这是可以肯定的”。报告所说“退到包产到户，稳定三到五年”，被理解为包产到户是应对经济困难的权益之计。

其二，中间地区实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还有百分之五六十的社队处于中间状态，办得不算好，包产到户的出现，使这些社队面临新的挑战。任其自流自发地大批搞包产到户，可能引起生产关系动荡，是不利的。为树立与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优势，如何改善这部分生产队的劳动组织和报酬制度，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这段话解释了为什么不赞成中间地区搞包产到户，主要担心是，“任其自流自发地大批搞包产到户，可能引起生产关系动荡，是不利的。”不利于“树立和巩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优势”。

什么是“统一经营，联产到劳”？中间地区如何推行这种责任制？杜润生在报告中用较大篇幅详细

介绍了河南省的做法，即“南阳经验”。“河南省许多地区在中间状态的社队实行了一种‘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生产责任制。以南阳县金华公社曾庄大队为例：把棉田按劳力分包给社员（不按人口或只以一部分土地照顾人口），叫责任区。定产量（产值），定质量，定费用、定奖罚（全奖全罚或按比例奖罚）；统一计划、统一耕种、统一供种子、农药和化肥、统一核算和分配。凡适于分散操作的农活，包括育苗、下种、喷药、施肥、除草、收打等，均由承包社员分别完成。”这种责任制的核心，是坚持了生产队的主体地位，即“四定”、“五统一”。

其三，先进地区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另有百分之二十五的社队，生产力先进，多种经营有不同形式的发展，集体经济比较巩固。这些社队有条件逐步推广去年中央75号文件所推荐的专业承包、联产计酬的责任制。”75号文件的界定是：“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就是生产队统一经营的条件下，分工协作，擅长农业的劳动力，按能力大小分包耕地；擅长林牧副渔工商各业的劳动力，按能力大小分包各业；各业的包产，根据方便生产、有利经营的原则，分别到组、到劳力、到户；生产过程的各项作业，生产队宜统则统，宜分则分；包产部分统一分配，超产或减产分别奖惩；以合同形式确定下来当年或者几年不变。”杜润生在报告中解释了这种责任制的优越性，是既可以满足社员联产计酬要求，调动个人积极性，也可以稳定生产队主体地位，发挥统一经营的优越性，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凌志军在《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一书中指出：“对于包产到户，新的方针，基本上具有画地为牢的性质。”“新的文件，由杜润生来解释赵紫阳的思想，并且以杜个人的名义提出，这有悖共产党文件发送的常例，但是却并不违背事实。这些思想与其说是出自赵紫阳，不如说是杜润生的深思熟虑。”。显然，凌志军比较了解这个报告的出台过程，但书中未述其详。

（二）“切三刀”政策起源

“切三刀”政策设想的直接来源，是赵紫阳、杜润生的一次农村调查。1981年1月1日至8日，赵紫阳到河南、山东、湖北等地农村考察，重点是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

杜润生随同赵紫阳参加了这次考察。1月11日，杜润生在九号院传达了赵紫阳考察中的谈话。在山东，赵紫阳对菏泽地委书记说：“包产到户适合你们的地方，类似情况约全国1亿人口。过去‘三靠’，现在调动了积极性，不用返销粮。全国可以减少几十亿斤返销粮食，这是贫困地区对于国家的大贡献。稳定几年，很必要，怎样前进，不要忙，再看看。老百姓要求三年，就接受老百姓的意见办。在稳定中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同时，赵紫阳也表达了对于包产到户继续扩展的担心，说：“包产到户扩散能力很强，可能冲垮中间类型社队，这些社队看来一下子巩固不容易。如果自发包产到户扩散厉害，要受损失。如何巩固中间社队，农口同志要想办法”。在这里，赵紫阳给杜润生提出要求，要研究应对之策。

杜润生回到北京后，仅用一周左右时间，就写出了政策报告。这就是《关于农村经济政策问题的一些意见》。1月18日，赵紫阳批示：“耀邦同志：送上杜润生报告一件，其中反映了我的一些看法。请考虑可否印发政治局、书记处、副总理一阅，并在《内部参考》刊登。请批示！”。19日，胡耀邦批示：“按紫阳同志的意见印发和刊登《内部参考》。（润生同志的信可不登）。”3月27日，中央办公厅将这个报告转发全党。当围绕包产到户的争论还在进行中，1981年10月，国家农委办公厅编辑、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农业集体化重要文件汇编（1958-1981）》，收入这个报告。1992年3月，原国

家农委宣传局局长黄道霞主编、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则没有收入这个报告。多年前本人知道这篇报告，是在一次闲谈中黄道霞告诉的。

严格来说，杜润生报告的意见并不是政策。因为规范意义上的政策规定，应该以中央文件形式下发。但是，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政治背景下，这个报告经中央领导批示转发全党，就具备了政策文件的色彩。尤其是时任总理赵紫阳明确表示“其中反映了我的一些看法”，更提高了文件的政策权威性。可以说，这个报告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政策规定，报告内容成为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政策意见，并在一些地方推行。“切三刀”构成了一个明确的政策演进阶段。

在整个1981年，尤其是上半年，“切三刀”成为政策主流。相当一些地方领导人，特别是不赞成包产到户的地方领导人积极响应，以安徽省第一书记张劲夫、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杰为代表。主流媒体也做了密切配合。1981年4月5日，人民日报第一版头条发表文章：“张劲夫、刘杰考察开封洛阳等地实行责任制情况后，认为“联产到劳”有利发挥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这种责任制有强大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关键在加强领导，及时解决问题”，文章说：“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责任制有两个特点，一是既能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又能充分调动社员个人的积极性，由于它坚持‘三不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不变，基本核算单位不便，按劳分配不变），‘四统一’（生产队统一计划种植，统一耕种，统一投资，统一管理使用牲畜、大中型农机具和水利设施），能够科学的组织利用和发展现有生产力，更好地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二是适应性广，这种形式的责任制，不仅经济水平处于中间状态的生产队可以采用，经济水平偏低的生产队采用后效果也很好，向更高形式的专业承包联产发展也比较自然顺当。”

当时一些地方领导倾注了很大精力推行“切三刀”政策。山东烟台地委书记反复强调：烟台作为经济发达地区，不适合实行包干到户，只适合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在1981年7月一次会上，万里说：“烟台地委书记讲了一通糊涂话。这样来压农民，是没有什么用的”。

（三）“切三刀”政策争端

在高层领导人中，关于“切三刀”政策的意见并不一致，持有不同意见的主要是万里。还是在75号文件规定切两刀的时候，万里就表示了不满。在切三刀意见出台后，万里也不认同，但他作为副总理，也没有公开表示不赞成。

万里的意见是，不论什么地区，采取什么样的责任制形式，要由农民自己选择。1981年6月，万里安排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张广友写了内参，表达了他的意见。万里本人明确提出要突破“切三刀”，是在7月18日听取农口领导干部下乡汇报会上。当杜润生汇报说，农委内部讨论的意见是，中间地区在生产队“几个统一”的原则下搞联产到劳或者大包干。万里反问：“实践经验够不够？否则，要犯主观主义”，“中国农民勤劳智慧，要领会”。随后，社科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所长詹武汇报，提出“三种类型不适应千变万化”，“具体不要这样限制。”万里表态：“不要强调这些类型，已经冲破，总之要因因地制宜。”“只要群众愿意，对生产有好处，就应该同意”。“形式应该由群众自己说，愿长期干就长期干”。万里还嘱咐詹武：“你们可以写文章，通俗点，叫干部群众都知道”。詹武后来写了文章，在当年《红旗》杂志第17期发表。在这次汇报会上，万里要求农委准备新的政策意见。7月31日，胡耀邦批示，要求起草新的文件。这个文件就是后来的1982年中央1号文件，即五个一号文件中的第一个。

根据万里要求，张广友的文章先在范围较小的内部刊物上刊登，再转发到县级内参上，后公开发表

在8月4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文章指出：“确定责任制形式既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切三刀。那么，究竟根据什么来确定责任制形式呢？从大家的汇报来看，概括起来有两点：一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适合哪种形式就采用哪种形式；二是把选择责任制的权力交给群众，尊重群众的自主权，由群众自己决定，不能由领导硬性规定，或搞包办代替，更不应当瞎指挥。”“不少同志谈到，从一种责任制形式改为另一种形式的责任制时，如果是领导硬叫改的，群众就认为是政策变了，如果是群众主动去改的，则认为是完备了。这说明，确定责任制形式，必须充分发扬民主，由群众自己来决定。”

根据7月31日胡耀邦批示，在万里直接领导下，国家农委组成文件起草班子，开始起草新文件。1981年10月4日至20日，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讨论了这个文件草稿。中央书记处于10月12日、12月21日两次审议修改，于1982年1月作为当年一号文件发出。这个文件指出，“目前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包括小段包工定额计酬，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联产到劳，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只要群众不要求改变，就不要变动。”由此，“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获得同其他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同等地位，也成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同时，农民可以根据自己意愿自主选择。

为什么后来给予这个一号文件崇高评价？是因为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从理论上，一号文件正式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认作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而不是仅仅依附于社会主义的“另类”；另一方面，一号文件直接结束了“切两刀”“切三刀”的政策限制，农民可以自主选择。将近两年来，中央的政策文件虽然允许部分地区搞包产到户，但有明确的经济条件限定，同时强调只是三五年的权益之计，不是发展方向。因此，农民们放心不下。一号文件做出新宣示，农民说了“吃了定心丸。”通常说第一个一号文件的核心是取消了包产到户的禁区，尊重群众的选择。这里的所谓“禁区”，不仅是一般意义上旧的政策禁区，而且也包括新的政策禁区，具体说就是“切两刀”“切三刀”形成的政策禁区。

（四）政策演进的根本动力

“切三刀”政策大致持续了一年，是大包干政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从政策演进的高层政治过程来看，最有力的直接推动者是万里。如同最早在安徽允许包产到户一样，万里面对中央关于包产到户的新禁区，也最先发力冲击。晚年万里曾称抵制“切三刀”是一场“斗争”。

但是，严格来说，“切三刀”并不是被万里批倒的。在当时的高策决策格局中，虽然万里不同意“切三刀”，也难以凭借一人之力解除。从根本上说，“切两刀”“切三刀”的政策禁区，是被农民推倒的，是被农民直接突破的。农民是结束“切三刀”政策的根本性、基础性力量。

作为“切三刀”政策主体形态，即中间地区推行“统一经营、联产到劳”，一段时间内曾被若干中央以及地方领导人积极推崇和大力倡导。但是，在1981年五六月份农委组织的农村大调查中，调查组发现基层很不适应，连县委书记也反映太难操作，一些农民甚至讽刺“四定”、“五统一”的政策规定是“脱了裤子放屁”。当上层还在倡导“统一经营、联产到劳”的时候，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锐不可当，一发而不可收拾。特别是包干到户，扩展之快超出了人们预期，表现出横扫南北、一统天下的强劲势头。十月上旬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召开时，预计当年包干到户就会超过50%。原来“切三刀”政策设想中，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地方限定在20%左右。原来划定的框框被迅速突破，“切三刀”形同虚设。在农村工作会议上，各省也纷纷反映不能再强调“切三刀”，不要再为包干到户设立限制。

从现有资料看，杜润生作为“切三刀”政策提出者，在1981年7月18日向万里汇报之后，没有再

继续倡导推行“切三刀”。赵紫阳的意见转变则晚一些。1981年10月20日，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杜润生传达赵紫阳意见：“‘统一经营、联产到劳’不要轻易取消，有同志说稳不住不要硬稳，但能稳住的地方要稳住”。由此可见，赵紫阳在这年秋天还坚持“切三刀”要尽量稳住，不要轻易取消。杜润生在这个讲话中，还介绍了河北、山东几个地方搞几个统一经营原则下包干到户的典型。赵紫阳的态度转变，是在1981年年末。杜润生后来回忆说：“1981年冬，中央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会后不久，赵紫阳到东北考察。他写回来一封信说，今后不要再强调不同地区不同形式了，群众自愿选择，选上啥就算啥，领导不要硬堵了。”。这封信标志，赵紫阳正式放弃了他和杜润生共同提出的“不同地区不同形式”的“切三刀”政策意见。

关于“切三刀”的争执，是包产到户政策进程中的重要阶段。不了解这个过程，就难以完整把握改革进程的基本脉络。但是，如果依据现有相关著述，难以理清政策转折踪迹。若干年来的农村改革历史研究，也很少有人去做这项梳理工作。张广友曾在文章中流露出受到了压力。谈及那篇关于“切三刀”的文章，他写到：“可是，没有想到这篇明明是表扬的报道，却引起了农口少数领导人的不满。原因是这篇报道在讲背景时，把万里对农口领导的批评写上了，成为‘抹不掉的历史存照’。对此，他们感到很不舒服。有的过去一贯是反对包产到户的，现在硬说自己过去就是包产到户的支持者。有的甚至说文章中的‘一刀切与切三刀’是针对中央某某领导的，说作者胆大包天，竟然批到中央领导头上来了。有的要求写文章公开批判。”现在看来，如果当时媒体上发生公开争论，可能更有利于后来研究者理清政策演变脉络。

结语：“大包干”政策过程，是两种政策主张不断争执的过程。具体看，这种争执的核心问题，是发挥集体优越性和调动农民积极性的关系。“一刀切”的政策规定，一律否定包产到户，是无视农民积极性，企图用空想的“集体优越性”来改造农民；“切两刀”和“切三刀”的政策主张，设想既发挥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也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从而调和人民公社体制与农民的根本矛盾，用所谓空想的集体化方向来规制农民，依然具有浓厚的空想色彩。

实际上，所谓“集体经济优越性”，不能与农民积极性相提并论。农民积极性是根本性的，离开农民的积极性，所谓集体经济优越性则成为无本之木。在高层发生争论时，面对反问，万里曾明确表示：“集体优越性和农民积极性如果相矛盾，我要农民的积极性，不要集体的优越性”。当有领导说：“马列主义是要教育、领导农民，你这是在做农民的尾巴，不是马列主义，而是尾巴主义”。万里作答：“我就是尾巴主义，就是要做农民的尾巴。”在一次听取农口领导的会上，万里还说：“我不懂农业，对农业并无成见，我也不知道哪种责任制好。但是，我知道，要搞好农村，最重要的是，领会中国农民的智慧和创造性，尊重农民的选择权力。”

现在，人们提到大包干政策，就会赞美一号文件。但是，在赞美之外，还要有持续深入的探究。大包干政策从“一刀切”到“切三刀”的流变过程，贯穿了两种政策原则和思想方法的冲突。深入探究高层决策过程，有利于认识八十年代农村改革的机制特征，有利于认识八十年代农村改革的政治逻辑。如果没有对于这个过程的深入检索，则无法深刻总结农村改革的历史经验，无法把尊重农民首创精神的改革经验贯彻到底。现在，这个主题的研究还很不够。（全文完）

（作者：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退休后，我们以“五微”建设乡村

朱启臻

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学习运用“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以下简称“千万工程”）经验，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千万工程”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以政府为主导，农民为主体，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在政府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后，作为个体的我们，可以为乡村振兴做些什么？我想谈谈自己几年来在乡村振兴实践中的一些体会。

我研究农业农村一辈子，有一些思考，在全国各地参观考察时也有很多感慨，2017年退休后，还想为村里做点什么。我的堂弟也是三农领域教授，善于出点子，帮助不少乡村走上致富道路，退休后和我的想法不谋而合。他提出一个建议，能不能把我们的研究成果落地到家乡，改变家乡面貌，带领村民致富？于是2019年，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大峪沟村，开始了参与乡村建设的实验。这里的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已基本改造完成，但乡村人走屋空、老龄化现象严重，传统产业衰退、乡村文化衰落、人际关系淡漠，缺乏生气和活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做了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归纳为“五微”模式。

第一，选择“微社区”作为示范点。我们在一个自然村从开展民居改造做起。该自然村有40多户，一半房屋闲置，不少房屋破败倒塌，无人居住。我们带头拆掉自家破旧的老房子，建设两层的现代别墅，特别注重厕所和厨房的改造，每间卧室都建有独立卫生间，厨房安装了橱柜和抽油烟机。在民居风貌上，保留了传统的尖顶灰瓦风格，并创立了村里第一家民宿。房子建好后，村民纷纷来参观。经过4年发展，如今该自然村建起20多栋乡村别墅和新民居，民宿也从原来的1家发展到12家。

第二，建设“微景观”提升村容村貌。有了漂亮的房子，还得进一步解决乱堆乱放问题，使民居变得更美观舒适。我们从庭院美化开始，聘请美学专家给村民授课，讲如何营造各具特色的乡村院落“微景观”。村民认识提高后，爆发出极大热情和创造力。他们在自己的院落里堆假山、栽果树、种花草、养鱼虫，充分展现想象力和造景能力。不仅如此，村民们还在庭院实施了亮化工程，每到夜晚家家户户各式彩灯闪烁，成为乡村一道亮丽风景。村民自觉自愿做的事情，不需要监督，没有检查和评比，也做得很好。

第三，组建“微组织”提高组织力。提高农民组织程度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分散的农户各行其是，难以形成乡村建设的合力。我们牵头成立“柿乡情农民合作社”，并以此为抓手把农民组织起来。我们为合作社聘请专家，给村民培训果树栽培技术、讲解营销知识、传授短视频制作技能；支持村民组建文艺组织，资助购买服装道具，每逢节日和重要活动，文艺表演队载歌载舞，丰富村民娱乐生活；还组织志愿者队伍开展植树、打扫卫生、整理公共环境、敬老等活动，帮助村民逐渐养成互助与公益意识。同时成立了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支部，支部成员包括返乡人员和本村村民，隶属于张坊

镇党委，为更好在“微社区”发挥作用提供组织保障。

第四，开辟“微田园”振兴乡村产业。乡村没有产业支撑，就留不住人。我们带头示范并鼓励合作社成员修建自家的小菜园、小果园、小花园，兴办小养殖园和小作坊，旨在打造一个“微田园综合体”。首先生产农产品，包括磨盘柿、食用菌、蔬菜、蜂蜜、猪、羊、鸡和鸡蛋等。其次，把“微田园”建成农事体验与科普教育的社会大课堂，为中小学生开展多样化农业科普活动，让他们在养鸡、养兔、种菜、种花、采蘑菇的过程中，了解农业生产过程，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体会农业劳动的艰辛，培养珍惜劳动成果的品质。其三，为民宿发展提供景观和食物资源，实现农业生产与民宿发展的相互促进。

第五，营造“微场景”让社区更和谐。提高农民素质是乡村建设中复杂而最具挑战性的工作之一。我们通过举办一系列培训，提高村民对乡村振兴的认识，并通过营造“微场景”实现对人的教化与影响。如把乡村振兴内容做成展板，把《弟子规》《朱子治家格言》等传统文化以图文并茂形式上墙，修建科普长廊，为街道胡同命名。通过场景塑造潜移默化地感染人们，鼓励向上向善，增强村民的归属感。我们还利用传统节日举办孝老饺子宴，聘请三甲医院专家为老年人义诊，营造敬老氛围。各个民宿小院里办起了“乡村会客厅”，经常请村民喝茶谈心，宣传乡村振兴政策，介绍全国各地现代乡村生活和乡村发展新经验、新理念，不断影响村民行为。以上是我们凭借自己力量在乡村做的一些工作。如今我们的家乡宜居了，产业发展了，风景漂亮了，人与人关系和谐了，年轻人也开始回乡创业了。其实，每个有乡村情怀的人，都可以从当地具体情况出发，为乡村发展作力所能及的贡献。乡村应该欢迎更多人才下乡返乡，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为乡村注入新的活力。

作者文中所提及的建设乡村特指北京市房山区张坊镇大峪沟村，该村被誉为“中国磨盘柿第一村”，主要发展以柿子为主的第一产业。村里种植磨盘柿的历史悠久，据北京果树志（房山区）记载，在明代，张坊磨盘柿被列为宫廷贡品，至今大峪沟村内还留有一座百年老柿树园见证着历史的变迁。1989年大峪沟村还被国家农业部、财政部批准为磨盘柿生产基地。2007年，张坊磨盘柿取得了“无公害”“有机”食品认证，被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批准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2019年，朱启臻、朱启酒两位教授回大峪沟村引领村民发展文旅民俗产业，创建“博士”小院集群后，以“五微”建设乡村，进一步有力地推动了该村柿子产业顺利发展、提高了广大村民收入。

（作者：中国农业大学农民研究所教授。来源：《中国村庄》杂志第9期）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战场”和“双引擎”

游 斌

2022 中央一号文件是新世纪以来，中央连续出台的第 19 个指导“三农”工作的一号文件。文件包括了 8 个部分 35 条，内容丰富，对 2022 年乡村振兴重点工作作出了全面部署。产业兴则百业兴，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和物质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乡村“五大振兴”第一个就是产业振兴。今年的一号文件就如何持续推进产业振兴指明了具体路径，并强调了发展重点。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和特色农产品，以县域为“主战场”，以打造农业全产业链和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为“双引擎”，构建产业融合发展共同体，通过特色产业发展赋能乡村振兴。

一、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战场”

县域是实现城乡要素流通的重要渠道，也是连接城乡发展的关键纽带。“县域”是“十四五”以来，一号文件中的“高频词”。2021 年的一号文件出现 11 次，要求把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切入点。今年的一号文件出现 14 次，在产业发展等方面进一步作出了更加细化的要求。强调“大力发展县域富民产业”和“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设”，将县域作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主战场。

1. “向上”承接大中城市疏解产业。今年的一号文件要求，引导产业有序梯度转移，推动形成“一县一业”发展格局。一直以来，由于缺乏“县域”经济的支撑和缓冲，农村劳动力流动受经济尤其是出口贸易的影响，呈现明显的“潮汐式”。要么全面流向东南沿海，而遇到经济不景气就又全面退回农村，对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近年出现“人口红利”将消失的观点。依托于县域经济的发展，形成有效的增长极改善区域辐射力与溢出效应，逐步形成“县—镇—村”分工合理的产业空间布局。推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探索在县域层面整合资源和集聚要素，能够有助于发挥农村集体土地和劳动力的作用，形成有竞争力、有特色、有规模的产业集群，重塑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

2. “向下”带动农民农业共同发展。今年的一号文件要求，大力发展县域范围内比较优势明显、带动农业农村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富民产业。一方面，为农民提供稳定就业机会，实施县域商业建设行动、促进农民就地就近就业创业。实施县域农民工市民化质量提升行动，大力开展适合农民工就业的技能培训和新职业新业态培训。另一方面，为农业发展提供生产线服务业，推动建立长期稳定的产销对接关系。推动冷链物流服务网络向农村延伸，整县推进农产品产地仓储保鲜冷链物流设施建设，促进合作联营、成网配套。支持供销合作社开展县域流通服务网络建设提升行动，建设县域集采集配中心。支持大型流通企业以县城和中心镇为重点下沉供应链；加快实施“互联网+”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

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双引擎”

打造农业全产业链和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双引擎。农业高质高效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尚未建成符合乡村产业体系的全产业链和农产品的品牌。农村产业融合发展不足，农业产业链脱离于农村，甚至处于断链状态，无法将更多的农产品附加值留在农村，难以产生强大的带动能力，农民

无法分享产业发展的经济价值，农民收入难以提升。农产品生产经营者对建设农产品的品牌意识比较淡薄，认为农产品和工业品差异很大，没有必要创建品牌，导致无法扩大农产品市场占有率，难以形成稳定的消费群体，限制了农产品的生产经营效益提升。

1. 打造农业全产业链。今年的一号文件要求，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鼓励各地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本质上是农业产业链的纵向延伸和横向拓宽，通过打造农业的全产业链，拓展农业的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纵向延伸：推动农业向上和向下延伸，今年的一号文件要求，重点发展农产品加工、农村电商等产业，加快推进农业产业化，形成产业链优势互补、分工合作的格局。通过将农业生产过程中的产前、产中、产后等诸多环节联结成为一个完整的农业产业系统，形成种加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产业经营格局，实现产品增值、产业增效。横向拓宽：今年的一号文件要求，实施乡村休闲旅游提升计划。支持农民直接经营或参与经营的乡村民宿、农家乐特色村(点)发展。将符合要求的乡村休闲旅游项目纳入科普基地和中小学学农劳动实践基地范围。通过拓展农业和农村功能，促进农业与休闲、旅游、生态、文化、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实现其生产、生活、生态功能的有机结合与互补，丰富乡村产业类型，提升乡村经济价值。

2. 加强农产品品牌建设。特色清晰的农产品品牌定位，能够最有力的体现出该农产品相对于其他农产品的比较差异化特征，而且在品牌形象上面有助于消费者进行合理的选购，从而既提升农产品销量，又提高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今年的一号文件要求，开展农业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提升行动。一方面，强调了推进农业品牌建设的重要性，强化产业品牌发展示范引领，鼓励农业生产因地制宜，打造强有力的区域公用品牌。另一方面，明确了品牌建设的具体路径，从品种培优开始，培育适合当地资源优势的品种；以标准化生产为重点推动农产品品质提升；加强对品牌的包装和宣传推广，通过系统化建设提升农产品品质和质量，实现农产品溢价销售，促进农民增收。

依托乡村特色优势资源，围绕“产业兴旺”要求，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大力发展发展特色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以及乡村旅游、休闲康养、电子商务等现代服务业，在县域范围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提升农业品牌影响力、农产品市场竞争力。通过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培育壮大服务主体、着力培育农业品牌以及有效对接外销市场，促进农民和集体稳定增收，实现共同富裕。

(作者：湖南师范大学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博士后。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2年第2期)

乡村振兴：亟待整饬的短板硬伤与对策

王金世

站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接续开展乡村振兴战略的起点上，展望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壮丽画卷，剖析以突击性、特惠性、局部性为主的脱贫攻坚所征服的一个又一个难点焦点与困惑，研判以渐进性、普惠性、整体性为主的乡村振兴战略可能出现的机遇挑战与风险，对照加快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的总体要求，不断提炼充实破解各种壁垒、瓶颈的能力与措施，降低风险挑战、减少羁绊缠绕，当务之急应结合贯彻《乡村振兴促进法》，从保障、靠实、推动、筑牢、扭住入手开局起步，探索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一、问题与根源

（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地位缺失，运行机制不畅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具有社会主义特色的所有制形式之一，在我国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发轫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在近七十年发展演进过程中，虽根据不同时期的发展需求，多部法律对其有过内涵外延不清晰、法律称谓不统一、组织架构不齐全、层级类别不分明、管理权限不明确、责任义务不对称的表述；部分部委和省市先后出台过一些类似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管理条例》方面的部门规章或地方法规，但就全国而言，终因缺少专门的法律文本，致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这个“特别法人”的法律地位模糊，筹融资渠道狭窄，运营方式单调呆板，利益联结疏密不定，长期处于摸着石头过河的境况之中。在运行机制上，从计划经济时“四大管理加分配”统的过多，到改革开放后“缴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放的太开，即使目前正在全面推进的以集体经营性资产为主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按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清产核资、确认成员、量化资产、赋码登记等程序成立的股份经济合作社或经济合作社究竟是企业还是事业？与依《公司法》规定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有何异同？是否具有财政扶持、税收减免特别是年终股利分红税费减免的权力？且个别地方虽按有关规定成立了理事会、监事会等组织以及相对应的议事规则，但在人员构成上依然复制粘贴了原有村组干部的模式，照样存在着制度规则印在纸上、贴在墙上让人看，讲在会上、说在嘴上让人听，撑门面、装样子，“穿新鞋走老路，开新方子抓旧药”的弊端。

（二）“农”的传人缺种断层，人气不足民风不淳

我们毋庸置疑广大农村为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养育输送了一代又一代数以万计的各类高素质人才的事实，更无法回避近年来很少有青壮年特别是男劳力在“广阔天地”里谋求发展的现状。在矿区域城郊、交通沿线呈现出能种粮的耕地被种砖、能种粮的人员在种砖的“砖业运动”；可在一些没有支柱产业或支柱产业欠发展山区村庄可以说50岁以下没农民，加之一些青年妇女或搭帮外出搞家政、或陪入园入学子女做伴读，或跟丈夫结伴闯天涯，“农的传人”从民工潮萌动时的“386199”走向“重阳”，

从缺“种”跌入断层，不仅孔雀东南飞，就连麻雀也都朝外飞，农村基本上甩给了留守后防的老弱病残，他们文化偏低、思想守旧，“一等二看三试验”随大溜的思维方式，很难找出一条适合当地资源优势和地方特色的可持续发展的致富门路，形成具有一定竞争力的拳头产品，农业生产从二牛抬杠沦为锄头铁锹和老人，朝天一把子收种去两回，能刨多少是多少，不谋发展、只图够吃够用减轻子女负担。一些村庄年头节下民工返乡，为传递友谊增强感情活跃气氛、蹓亲友摆酒场打麻将，酗酒滋事、聚众赌博时有发生，寄哀思问前程求发财、修宗祠设道场唱庙会封建迷信活动死灰复燃，大番小事轮流坐庄、攀比宴请，你家三六九、他家二五八，与有钱打麻将没钱买农资、有钱喝小酒没钱行孝道形成鲜明的对比；耕读传家不再是人人羡慕的好家风、抢种抢收打院修房从邻里互帮互助开始向按日付薪甚至直接对外承包过渡，养儿防老被看门守孙子所替换、“娶了媳妇忘了娘”不再是人们闲聊的戏言等等，给淳朴的民风掺和了极不和谐的杂音。

（三）农民小富即安、等靠要与仇富现象有所抬头

近年来，随着“两不愁三保障”问题的逐渐解决，一些农户把“不愁吃穿”当小康、“稍有节余”当富裕，满足于吃饱穿暖，只求过得去，不求过得好、过得更好，热衷于举债购车买房添摆设、打院修房讲排场，重生活消费、轻生产积累，只管当前不顾长远，对扩大再生产经营规模投资不热心，对一些即使稍加投资就能很快见效的事情，也不愿意追加一点人力、物力、财力；同时随着强农惠农富农补贴和脱贫攻坚力度的逐年增加，一些人把党和政府的帮扶当应该、恩惠当白得，视“贫困”为门面招牌、变用“心”脱贫攻坚为用“心眼”脱贫攻坚，拖熟人拉关系傍靠山甚至不惜一哭二闹三上访、请客送礼给好处之手段争当“穷人”；一些人穷不思变、却把贫穷归究于命运的安排，种庄稼耐不住风吹日晒，做生意受不了闹市争吵，搞劳务经不起起早贪黑，跑贩运吃不消舟车劳顿，大的懒得干、小的不愿干，东游西逛、无所事事，并把勤俭节约、吃苦耐劳当愚昧，冷了找墙根、热了找树荫、渴了饿了找政府、酒足饭饱骂干部当本事；他们不仅甘愿本身贫困，而且嫉贤妒能、心态扭曲，害怕别人过得比自己更好、容不得别人家锅里冒烟，诸如在鼓励土地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中流转和土地托管过程中，他们担心自己的承包地流转或托管后，受让方很快得利发家致富，用我干不了、你也别干成的方式，搬弄是非、哄抬租费和工时费用，宁愿耕地抛荒撂荒，也不给流转甚至唆使挑拨一些不明就理的群众插花种植排异品种、拆除生产设施、截断渠系道路、撕毁流转合同、铲除流转地青苗、哄抢流转地产品等阻挠流转。

二、对策与建议

（一）确主体，尽快颁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

在加快法制中国建设的进程中，首先，应围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基本特征、法人属性、功能作用、运行机制、层级架构、资产来源、利润留成、收益分配、融资投放、商贸物流等重大问题，尽快颁布出台尊重历史沿革、面对现实需求、兼顾未来发展的具有一定前瞻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彻底改变长期以来涉及地域广阔、牵扯人员众多、生产经营门类庞杂、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一段时期“四不象”、一段时期“鸭嘴兽”甚至为图好使老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非驴非马”当“骡子”用的无法可依的局面。其次，应适时跟班出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议事决策规则，人才开发引进办法，完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会计制度，为其规范有序运行提供制度保障。另外，还应明确赋予基层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农民群众各自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以及执行不力或违反规定后，应该怎样处理、由谁处理等职能。不断巩固完善双层经营体制，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有效实现形式，激活唤醒“统”的职能与潜力，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力，突破“集体空、没人听”的壁垒，实现“集体有、跟着走”的跨越，推动“统”“分”相得益彰和谐共生，保障乡村振兴，使之真正成为凝聚人心的“家”、拓宽渠道的“路”、联结市场的“桥”、抵御风险的“墙”、共同富裕的摇钱“树”。目前，这一点在中西部欠发展地区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二）聚人脉，拓展人居环境和生产经营空间

在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粮食功能区、重要农产品保护区“两区”用地建设、重要农产品品种多样、供应充裕、价格稳定、保障供给的前提下，坚持以农民为主体，以当地特色优势资源禀赋为基础，以引导不包办、支持不胁迫、放活不放任的方式融合发展农村一二三产业，切忌定指标下任务、摊大求洋，防止走弯路、翻烧饭，遏制图统一抱牛头拨青苗、一刀切，杜绝为防尘禁机收、要喷淋等“神操作”，用既不“缺位”，也不“越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赢得人心，让农民更多地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吸引群众；在不断提高农业产业化程度进程中，靠实施乡村振兴的关键，要针对农业生产投资大、风险高、见效慢和农产品“多了不得了，少了了不得”的特点，充分运用“两个市场”“两个循环”“互联网+”等信息资料、研判各类产业集群规划成果应用的时效性、结构性、合理性，杜绝因眼热攀比跟风，就某一产业村村点火、户户冒烟，你有我有全都有，再现“蒜你狠、姜你军”“前年的茄子、去年的蒜、今年的水果比水贱”的现象，减少损失浪费，提高农业比较效益，以较高的效益撬动有志于广阔天地创新创业城镇人员、进城务工人员带资带技返乡回流领办创办新型农业经营或服务主体，化解谁来种地的难题；进一步落实化肥农药减量使用、养殖粪便零排放、秸秆及废旧农膜回收转化利用等农业面源污染措施，加快完善通电通水通路改厕改炕改灶“三通三改”“碳中和”行动，改善生态、修复环境，筑牢乡村振兴的基础。借助城镇子女可继承父母农村宅基地的政策红利，吸引更多的城镇离退休人员回乡投资养老，增添乡村人脉；重新审视调整农村义务教育资源整合得失，最大限度的降低农村幼儿从入园开始就需寄宿陪读的比率，减轻农民对子女教育的投资成本，活跃农村人气，促进广大农村人的全面振兴。

（三）治懒庸，加强农村思想文化教育

在广大农村适时开展以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思想教育活动，让“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入心入脑，并逐渐潜移默化成为农民群众永恒的自觉行动，让吃苦耐劳、诚实守信、孝老敬亲、善行义举等传统美德固化为农民群众不变的本色，让广大农民特别是年青一代知国情、识乡情、懂民情，掌握全体农民富裕程度，摒弃信命运不信科学、讲迷信不讲马列和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意识，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思想，走出“等、靠、要”和“人穷使瞎心”的怪圈，坚守公序良俗、推动乡村振兴。同时，要充分运用各种现代技术手段和大数据平台信息，科学、精准甄别各类帮扶、救济、兜底等低收入群体，强化动态管理和“离娘断奶”与自我革新措施，“输”“造”并举、以造为主，不断增强他们的造血功能和免疫力，该接续的接续、该终止的终止、该退出的退出，特别是要加大对极个别有劳动能力与赡养能力的好逸恶劳人员套取骗取补贴补助行为的惩戒力度，该收缴的收缴、该处罚的处罚；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扶持力度，量化细化强农惠农富农措施，变多数惠农政策依田亩人口、贫困程度发放方式为目标成果奖补，彻底铲除好政策诱发的懒惰庸俗土壤和真正勤劳致富人员在脱贫攻坚中八不沾现象，激发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动能。

（四）强组织，加快各类带头人培养遴选

要按照“五优先”的原则，不断强化各类组织建设。一是选好“领头雁”，应强化以党支部为核心的村级两委班子建设，在支持和鼓励村党支部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两委一社”班子成员交叉任职、加大“大学生村官”、村干部公职化的进程中，既要筑巢引凤、又要强化对乡土人才的挖掘培养利用，既要固巢养凤、又要防止招来姑爷气跑儿，既要超前谋划、又要力戒脱离实际、曲高和寡，既要甘于奉献、又要善于珍爱自己，既要靠实责任、又要保障权利，形似百鸟朝凤、群鸟齐鸣，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战斗堡垒。二是配齐“护航者”，应进一步加大基层农林水电、教科文卫等公共服务组织建设，对线断网破、人员结构老化的，该增加的增加、该充实的充实，加大柔性人才引进力度，彻底打通“最后一公里”，让公共服务尽可能的满足现代农业农村生产生活需要。三是打造“排头兵”，以“一村一名大学生”“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等计划为抓手，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一村一品”规范提升工程为契机，将优质教育资源送到田间地头，不断强化“一懂两爱”培训教育，增养造就和储备现代农业产业、生产和经营以及新农村建设所需的各类人才，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扩大提升产业集群、延伸拓展产业链条。四是集聚“追梦人”，要大力倡导“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的思想，坚定“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创造出来”信念，扭住乡村振兴的核心，不断优化劳动布局、调整人力结构，凝聚力量，提高农业农村农民质量、效益和竞争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中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作者：甘肃省平凉市农业经营服务中心副主任、高级经济师。来源：《中国乡村发现》2023年第1期）

七校学者联合调研“种地”课题

明海英

乡村振兴发展是一项重大的时代课题。2024年以来，就“种地”问题，7所高校的有关学者团队深入农村一线调查研究，将论文写在了中华大地上。

围绕农村土地归属、农业经营形态和农民种地意愿、土地资源利用情况，华中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山西大学、山东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河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学者联合组建“农村经营形态”全国调查项目组，深入30个省2000多个村庄，调查访谈了4000余名农户。调研数据反映出农业农村发展的一些新变化、新趋势。

新型职业农民在加速形成

多年来，“谁来种地”已成为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构建现代农业经营体系，以小农户为基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重点、社会化服务为支撑，加快打造适应现代农业发展的高素质生产经营队伍。

浙江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应小丽率团队前往浙江省浦江县实地考察，具体了解山区“小块地”如何变成“致富地”的治理实践。他们与该县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交流，采访农企、大农户、小农户等具体实践者。特别是围绕该县如何通过实施“三分六统”模式，激活低效山区“小块地”，建构农企、农户和村集体的“共富合伙人”创业关系进行了重点调查。

在甘肃省庆阳市开展田野调查时，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慕良泽发现，年富力强的农民大多进城务工，而真正务农的是他们的父母，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任重道远。种地给农民带来的回报期待提高，但无论是正在种地的中老年人，还是未来要种地的青年人，都将种地当作“最后的保障”，因为土地承包权非常珍贵。其中包含了中国小农的“安全”意识与生计思考。

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浩天发现，在一些产业特色鲜明的乡村，地方土地流转的比例非常高，种植大户将成为土地耕作的“新主人”。一个比较突出的新现象是，新型职业农民正在走进乡村，其中不乏退伍军人、成功企业家，也有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山东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陈国申通过调研发现，这些新兴职业农民从事农业，具有规模大、科技含量高、增收效果好等特点。

陈浩天表示，智慧农业已呈勃兴之势。特色化、产业化与智能化的农业生产方式，已被种植大户广泛接受并运用。部分地区的种植大户已经完全实现了“订单农业”的销售模式，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技术使“远程种地”变为现实，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手段贯穿于田间管理的“耕、种、管、收”等多个环节。

从“会种地”转向“慧种地”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教授陈军亚与团队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的对象包括湖北省 22 个县 140 个村的 370 多位农户。调研数据显示，此区域内由高龄小农户经营的“老人田”，50 岁及以上群体占比高达 85.9%；70 岁及以上群体占比接近 18%。高龄小农户对农业机械化运用的实际需求相当迫切，但对目前农业机械的实地适用性等满意度不高。

相比之下，由“种粮大户”经营的“大田”，50 岁以下的群体占比超过 90%。他们不仅机械化程度高，对农业生产经营的技术需求强烈，而且购买农业保险等风险防范意识强，但存在土地流转短期化、流转合约临时化、产业经营短链化等特征。

陈军亚表示，高龄小农户是事关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安全和稳定的基础力量之一，种粮大户是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支撑，未来中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在于这“两块田”和“两类人”，既要“稳基础”，更要“强支撑”。如何让 50 岁及以上的高龄小农种好“老人田”，让 50 岁以下的种粮大户种好“大田”，国家政策的强力保障具有决定性作用。

浙江省浦江县通过变革山区农业生产模式，构建“农户和农企、村集体”的致富共同体，实现了农企、农民和村集体均有好收益。对此，应小丽表示，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引导作用，如何更好地迭代基层治理创新实践，拓展山区农业共富空间和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理论指导。这既是实践主体的渴盼，也是学者学术报国的使命担当。

深入调研陕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河南省、福建省等地后，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发展学院公共管理系主任何得桂认为，我们未来要加强农业现代化、农村市场化和农民组织化相关研究，加快建设现代农业经营体系、组织体系，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以促进乡村治理有效，进而更好地提升农业竞争力、增强农民获得感。

“减少种地成本”“提高种地收益”，是两个备受关注的关键词。慕良泽表示，从“发展型治理”角度来看，就是要探究现代农业的规模化发展与治理的精准性问题，分析农业的产业化发展与务农的社会保障问题，以农业农村的“结构优化”与“效能提升”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解决‘谁来种地’问题，既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也要遵循规律、积极作为，更要强化系统思维和顶层设计。”何得桂表示，要积极回应农业发展主体最关心、最迫切的问题，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从而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更好地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农户社会化服务体系亟待加强。陈浩天表示，政府要持续加强对农户各项社会福利的投入，解决社会化小农户的后顾之忧。同时，要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发挥政府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中的主导作用，积极培育中型种植户的积极性，降低规模种植的风险，实现农户从“会种地”到“慧种地”的转变。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不懈夯实农业基础，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哲学社会科学界责任重大，大兴调查研究，为党中央献计献策，一定能够助力打好乡村全面振兴漂亮仗，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作者：社会科学报记者。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2024 年 4 月 2 日）

“弱资源村”的文化振兴该从何入手

毛晓雅 杨钰莹

在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普通村子，文化赋能乡村该从何入手？在皖南，一批新乡人与当地村干部、村民一道，正在进行一场乡村文化资源发掘、整理、活化利用的探索。

“老人拿出家里瓷板画，满满一层灰，拂去灰尘后才看清楚画中人，原来是他的太爷爷，再一看落款，还是清咸丰年间的举人。”张靓秋回忆道。

对话中的老人是安徽省黄山市黟县丰梧村村民王寿权。起初张靓秋请他讲讲祖上有什么典故，老人连连摆手，闭口不答。但架不住一再追问，他这才拿出了家中的瓷板画。“后来老人来了兴致，讲得停不下来，追着我们说。”张靓秋笑着说。

在丰梧村，不止瓷板画，还有更多“蒙尘”的记忆正在被发掘，这也是张靓秋和同为建筑设计师的丈夫刘鲁滨深入该村进行文化赋能乡村探索的目的之一——唤醒“沉睡”的乡村文化。

文化如何赋能乡村？一千个村有一千种答案。受地理历史、自然资源、经济基础等因素影响，每个村庄的文化基因与禀赋各有特色，能撬动的社会资源也不同，从而分流出生强资源村和弱资源村。

在皖南，文化资源强村灿若星斗，如享有世界文化遗产之誉的西递、宏村，或是被朱熹赞为“天下第一村”的呈坎，抑或是有“中国古祠堂建筑博物馆”之称的南屏等，这些村历史文化资源厚重，文化品牌吸引力强，保护、传承、挖掘文化资源都走在了前列。

同时，更多的是名不见经传的弱资源村，它们该从何处着手？在丰梧村、西溪南村、碧山村，一批像张靓秋夫妇这样的新乡人与当地村干部、村民一道，正在进行一场乡村文化资源发掘、整理、活化利用的探索，试图走出一条普通村子可以借鉴的文化赋能乡村路。

唤醒：看见乡村的“高端价值”

每个乡村都是有生命的。正如皖南地区诸多传承了上百年的古民居，只要有人住，就能赋予它灵性与活力。

在丰梧村，王寿权一家至今还住在祖上传下的老房子里。房子依山临水而建，门前丰溪河清流见底，屋内一梁一柱均为榫卯，木雕刻镂典雅工丽。站在明堂天井下，即便正午的太阳光线散落进来，也显得柔和。房间里人们并不因为外来客打乱生活节奏，在午休的大人，在写作业的孩子，摇头晃脑的电风扇，互不打扰、一派从容。

“最初我就是被这个村古朴的气质、良好的生态吸引来的。”朴蔓农场的主人褚一凡2020年来到丰梧村，是最早为这里注入新鲜血液的新乡人之一。经过几年细水长流的修建，绿油油的水稻田，青山环绕中的农场驿站、露营基地一点点起来了，丰富着村庄的业态。与此同时，村里也开始有人办民宿。如同石子投入湖水，一层层涟漪荡漾在这个小山村，分别毕业于耶鲁大学、哈佛大学的张靓秋、刘鲁滨

夫妇就是其中一层。2023年初，他们来到丰梧，给这里带来一场名为“丰梧季”的乡村实验。

不同于西递、宏村、呈坎等传统建筑连片的村落，丰梧村保存完好的古民居寥寥，也并没有负有盛名的历史人物。张靓秋夫妇思考着，在历史文化资源平平的乡村进行文化赋能的尝试，该从何入手？他们认为，皖南许多乡村虽然没有保留下大量古建，但基本的村庄肌理仍在。如将村民的个体记忆编织在一起，便能组合为村庄文化历史的长河。于是，他们决定进行“文化编织”，留住村民的个体记忆。

王寿权老人家对面，在建的乡村记忆博物馆已接近完工，即将在9月底启用，届时这座被定义为“活”的乡村文化空间，将摒弃掉一板一眼的机械叙事，通过鲜活的物件串联起村民们的记忆节点。

68岁的村民王茂生没有想到，自己30多年来随意记录生活的日记，有朝一日会作为展品展出在博物馆。他觉得日记里都是琐碎生活，“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但张靓秋他们把它当个‘宝’，一来就盘着腿坐地上，听我讲40年前做民兵营长、文书时期的生活。”

入户调研中，张靓秋还“淘”出了许多见证村民生活变迁的老物件。比如老会计陈新荣家里有把舅舅传下来的乌木算盘，算来有100多年历史，珠子不灵活，摸起来还有些干涩，但见证了陈新荣一路从年少学徒，到后来参加供销社，再到糖烟酒公司的人生轨迹。

革命军人证明书、粮票、旧课本……村民们开始主动展示自家的“老玩意”。从文物保护的视角，村民家里的老物件似乎不足以“登堂入室”，但却是每个普通村民生命历程的摘选，同样是大历史大变革的见证。刘鲁滨回忆：“一开始，村民对我们有所防备，不乐意讲，但跟他们熟悉之后，有很多人主动找我讲，这就是文化自信的提升，也是我们想达到的和村民互动的效果。”

丰梧村的文化拼图正在村民个体记忆的编织中逐渐完整。接连涌入的新乡人是帮助该村梳理文化脉络的关键。本质上，文化产生于实践活动，与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本地人只因“身在庐山中”，认为只是寻常。而当外来者以陌生化、差异化的视角去切入，才能玩味出其中不寻常的真谛。这些在城镇化进程中被保留下来具有独特性、稀缺性的文化资源，正是乡村“高端价值”的体现。

距离丰梧仅5分钟车程的碧山村，因文化唤醒带来的乡村价值体现已经颇有成效。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诗情画意的碧山村不仅有李太白的盛赞，还吸引到100余位新乡人来此定居创业。顺着村里的枞溪河水慢慢走，碧山书局、碧山工销社、猪栏酒吧、牛棚咖啡等业态就像从古村“长”出来的，在古建筑、古民居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元素，让人捕获惊喜、眼前一亮。

“乡村质朴自然的环境更容易激发文化艺术产品灵感，不能以传统眼光打量现代乡村。我也只是换了一种更直观地见天地、见自己的生活方式，这种疗愈感带来的情绪价值，是城市给予不了的。”“村口小卖部”的店主李慧姐7年前凭着对碧山书局、猪栏酒吧的向往，从芜湖市来到碧山村旅游，从此便扎根在这里。

和李慧姐一样，许多游客都喜欢在碧山书局二楼静坐一会儿，沉浸式享受乡村文化带来的精神愉悦。城市生活节奏快，乡村包容人们情绪的释放，一收一放间，人的心理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城乡的功能性互补得以体现，这也是更多新乡人参与乡村文化唤醒发掘的重要原因。

尊重：激活乡村文化是个慢变量

十步一景，五步一画。行走在皖南的村巷小径，青瓦白壁的淡雅色调，与周遭青山碧水相契相融，一栋栋徽派建筑依山就势地“生长”在皖南乡间，体现着“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建筑是文化的载体，徽派建筑中对天人观的强调不言而喻。对于正在丰梧村进行乡村建设的张靓秋夫妇而言，激活乡村文化的过程也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智慧，即强调文化的“在地性”。

何为“在地性”，即是在尊重当地文化肌理的前提下，创作出与当地水土高度相融的文化艺术产品。具体到实践中，张靓秋夫妇虽然确定要在村里进行公共文化空间改造，但改哪里，为什么改造却要仔细斟酌。

彼时，周涛涛在村里担任第一书记，就改造文化空间的事情，他特地去收集了村民建议，“我们这里经常下雨，帮我们设计一些遮风避雨的地方，方便大家在一块吃饭聊天。”

掌握了核心需求，后续便依次有了徽州巷陌、水渠廊桥、田野驿站等公共文化场所。

徽州巷陌位于村内交通要道，基于村内的吉祥亭改造，长亭修建的时间已不可考，但功能就是给村民提供休憩之所。经张靓秋团队改造后，原先破败的长亭变得既古朴又现代，搭建好的顶棚又满足了村民避雨休闲的需求。村民叶梅兰家正好在吉祥亭侧，“每天下午我都和村里其他老人们一起，在长亭乘凉说话，大家说说笑笑，心情都变好了！”叶梅兰说。

水渠廊桥跨村内丰溪河而建，改造前曾是废弃水渠，但村民们至今还能记得早年集体修水渠的场景。水渠“复活”后，“常有村民在饭点端着碗来到这里，边吃饭边聊天是当地人的习惯。”刘鲁滨说。

田野驿站则建在入村的乡道旁，以做旧的木材搭建起一处艺术感与实用性并举的小型艺术装置，与远方黛色山峦相映成趣。记者参观时，正遇上三两村民摇晃着蒲扇，乘凉休憩，田野清风似乎都吹向了他们的方向。刘鲁滨看着这一幕很欣慰：“这就是我们的目的，达到了。”

“改完后村民体验感很好，年轻人回来看到环境干净了也开心。最重要的是，让村民感到被尊重。”周涛涛说。

“针灸”原本是城市更新中的概念，旨在通过建筑空间的小规模更新优化，激活整个区域的活力。张靓秋说：“这几处公共空间改造就用了‘针灸’概念。我们在尊重丰梧村传统文化和村民生活习惯前提下，植入新旧结合的一些元素，给村民提供生活便利，乡村也因这些公共空间而‘活’起来。”

在离丰梧村一个小时车程的西溪南村，激活乡村文化这一慢变量已经累积到了“质变”的突破。

西溪南建村距今已有1200余年，村内明代徽派建筑老屋阁及绿绕亭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刚刚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徽州塌坝也坐落于此。而村里最吸引人的“金字招牌”，莫过于葱葱郁郁、绵延6公里的枫杨林，林中湿地与澄澈清明的丰乐河相呼应，置身其中，如同漫步在“绿野仙踪”。

“单是古建筑，或单是枫杨林都不足以让西溪南村火起来。”西溪南村党总支书记吴志明说，“在社交媒体上爆火前，西溪南一直在埋头积蓄力量。有完好保存的古建筑和民居，也有碧水环绕的生态景观，这都是我们长期边保护边探索开发的成果。”

今年“五一”假期，西溪南村“火”了，实际接待游客达15万人次。面对突然涌入的大量游客，西溪南村依然保持着清醒：保护好枫杨林，保护好古建筑，这是根本。

“枫杨林根系发达，可以挡风雨、阻洪涝，以前每到汛期，洪水遇到枫杨林后都会拐个弯，确保了西溪南村不受洪涝灾害。”吴志明说。

枫杨林守护村民安全无虞，村民也自发守护枫杨林生态，于是便首创了村庄湿地开一半、留一半的轮休制度。记者采访当天，林中清晰可见轮休的红色标志牌，轮休区内树木依然葱郁，并无游客打扰休息中枫杨林的宁静。而在另一边，孩子们笑着闹着在浅水区嬉水，游客在开放区的翠绿天幕下或拍照，

或游玩，动静相宜，勾勒出和谐的生态图景。

尊重乡村意味着要找到“平衡”。面对散落在乡村的历史遗址、古民居、好生态，要平衡好古与新的关系，找到二者共生的结合点。既尊重历史、尊重自然规律，又不循古复古，通过融入现代元素，与现代人生活结合，文化得以延绵兴盛。

合力：原乡人与新乡人同向共赴

马头墙层层叠叠、高低错落，以青砖垒砌的线条，跳动着韵律之美。在这些皖南古村，年轻人不断涌入，新乡人与原乡人相互融合、彼此碰撞，演奏出一曲曲和谐灵动的乡村乐章。

年初，周涛涛的驻村工作已经结束，但“丰梧季”的使命还在继续。记者采访当天，他正好回村和刘鲁滨讨论乡村记忆博物馆展陈摆放的问题。刚进村，村民朱灶莲大妈主动迎上来：“涛涛，你回来啦！”大妈很惊喜，拉着周涛涛就开始感慨，“你一走，我们很多人都舍不得……”

周涛涛中等身材，面容憨厚，笑起来有很强的亲和力。他自我总结说：“乡村是熟人社会，村里的事情没有村民支持办不好，‘丰梧季’就是个例子。”

60岁的村民组长王长峰性格耿直，对村里大小事很上心，在村里很有威望。去年10月，村里着手建造记忆博物馆，本来是个好事，但挖掘机却遭遇“三进三出”，每次都被王长峰带着村民挡了出来。

“因为那片空地有一些健身器材，平时村民也可以去晾晒粮食或者其他东西，损害村民利益的事情，我不能答应。”王长峰态度坚决。

村民的反对让张靓秋苦恼又委屈，但周涛涛明白，工作要推进，就必须尊重村民想法，双方要各退一步想。随后，周涛涛专门请王长峰和村民到村委办公室，打开电脑，展开图纸，耐心解释：健身器材将安置在村里别处，博物馆建成后，一楼仍是开放公共空间，村民可以自行出入使用。

“我们已经在这一楼办过几场红白喜事啦！只要利于村民，利于丰梧村，我们举双手赞成！”王长峰笑着说。

热心肠的王长峰开始主动为项目出点子出力。比如台阶上要使用毛石等自然材料加上少量混凝土，但外来施工队觉得耗时耗力，不愿意去捡石头，王长峰看不惯，一大早六点多就泡在寒气侵骨的河水里，用尺子量，一个一个挑选合适的石头。被感动的张靓秋也意识到团结村民的重要性：“有村民参与建设，对激发村庄的内生动力和活力至关重要。几方面共同努力，价值同向，乡村才会欣欣向荣。”

然而欣欣向荣的共同愿景并非一笔挥就，每当周涛涛提起“丰梧季”的艰辛，都忍不住感叹“太累了”，他调侃自己像个“变压器”。“村民、艺术家等各方面的压力都向我汇集，当时村里没人做过类似的事情，每天一睁眼就在面对质疑，再去解释、沟通，时常想放弃。”

周涛涛回忆起项目落地时的艰难：“村里的施工队队员都上了年纪，虽然也在对标图纸，但对某些细节，比如颜色是黑的或是灰的，两公分厚还是三公分厚，他们比较粗线条，但艺术家们‘火眼金睛’，执着要求返工，但返工就意味着施工方要赔钱……类似很多与施工方的利益矛盾，有时候还得镇里面，大家作退一步想才能解决问题。”

周涛涛解决矛盾时常有“作退一步想”的思路，追根溯源，这一“方法论”竟是在徽派建筑中得到的启示。

观察徽派建筑外围，屋外墙角常常有被人为抹平的痕迹，俗称“拐弯抹角”。相传清道光年间，开封知府胡文照回西递村修缮祖居，看到小商小贩拉货挑担不易，便主动将屋外墙角削去三分、侧门墙界

后退半米。后来胡知府的做法被邻里纷纷效仿，流传至今，成为古徽州地区“和”文化的注脚，也演变为今天黄山市推进基层治理的“密钥”。如今丰梧村以“和气”带动一群人共促乡村发展，便是“作退一步想”工作法的鲜活例证。

视线转到西溪南村。新乡人温均畅既是高端民宿的合伙人，又是村里的义务“乡村规划师”。最近，他与村里的大物业公司合作，着手做“树下咖啡”的新项目，但也遇上了一些沟通上的麻烦。

作为艺术家，温均畅讲品质，主张“慢工出细活”；但企业讲效益，更重成本和利益，希望“快刀斩乱麻”。快与慢的对立让温均畅有点“心累”。好在吴志明经常帮他开解：“慢的快不了，好的作品需要时间，你慢慢做，考虑好再做。”

温均畅是2017年头一次来西溪南村。当时的他站在村口丰乐河桥上眺望，远处云雾升腾的壮观景象让他心荡神怡，之后便决定在这里投资发展民宿。7年心血投入，他早已将自己视为西溪南的一员，经常为村里修缮改造提建议。

“村里翻修老石板路，我建议整平之后不要丢碎块，放回去垫平就好，既漂亮又耐用。之前翻新路，用的都是新石板，材质太软，一压就破，很影响村容。”就路的问题，温均畅又忍不住给吴志明提意见，“我这是‘路见不平’，经常提意见，让村干部‘头疼’。”温均畅笑着说。

说到底，乡村建设需要各方齐力推进，外来人才、政府、村民、企业各方是合作者，在磨合中必然少不了矛盾摩擦，但各方更是共同体，向着共同建设好乡村这一个目的前进。所谓“志合者，不以山海为远”，既然都是为了乡村更好，又有什么不能“作退一步想”呢？

活力：文化带来无限可能

斗转星移，两百多年前的徽商巨贾在修筑房屋时，不会想到这一修，不仅见证了他们的衣锦还乡，更给家乡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资源，泽被后人。文化无穷尽，创意无限大，二者的碰撞总能带给人们新鲜体验，激发出文化赋能乡村的无限可能。

徽州腊肉融入萝卜丝饼，徽州番茄、干辣椒拌入意大利面包，徽州豆腐乳调制法棍蘸酱……这些徽州风味“混搭”西餐的创意美食，均出自西溪南村的溪边55面包咖啡店。店主许若侠与黄敏是对来自宝岛台湾的夫妇。

“我们希望启发村民打开思路，用创新办法演绎在地文化。这样更能促进本地文化产业良性发展，避免千篇一律的业态和恶性竞争。当每家每户有了自己的创意产品，村民就有了产品差异化带来的增收空间。”许若侠坦言。

实际上，关于如何鼓励村民拓宽赛道、创业经营，西溪南村做出了许多探索，也有不少村民成为直接受益者。

“90后”村民柯世豪运营着村里的摆渡车业务，为了服务好日益增长的游客，大物业公司将摆渡车从一开始的7辆增至14辆，这才勉强满足游客需求。再沿着村内中街往下走，一幢干净整洁的民房出现在眼前，匾额上写着“后院有请”的字样，“进来我家坐坐吧”，原来是柯世豪家经营的农家乐。

2015年，柯世豪爷爷柯家治敏锐察觉到乡村旅游的机遇，成为村里第一批兴办农家乐的村民。“我家祖上六代木工，原先家里便是开木工店的，老房子建于明末清初。农家乐一开始叫‘柯家小院’，我接手后想着换个更有趣味性和吸引力的名字，于是就有了我媳妇起的‘后院有请’。每年农家乐和运营摆渡车的收入加起来有20多万元，一家人能齐齐整整在一起，比在外打工好多了。”柯世豪说。

村民在“家门口”务工，收入同样可观。余腾辉是一名年轻摄影行业从业者，早年间在黄山市区摄影，偶然的机​​会他回到家乡西溪南，发现早已换了天地，尤其是旅拍行业的入驻，让他觉得在家也有“用武之地”。这家名为“达味”的旅拍店，老板何昊是东北人，从2019年4月来到西溪南到决定在这里开店，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村里游人如织，店里生意也风生水起，余腾辉每月能拿到上万元的工资，很是满足。

作为“后起之秀”，今年3月，丰梧村入选安徽省第二批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建设名单，将获得一笔新的资金支持。“丰梧季”也将持续发酵，张靓秋夫妇计划着利用他们名校校友资源的优势，再招募一批年轻人到丰梧开展公益服务，为下一步向新业态延伸做足准备。

朴蔓农场新建的米酒加工生产线、稻米生产线已经运转起来，来农场游玩、团建的城里人总会带点大米或米酒回去，产品供不应求。农场业态开始向民宿延伸，眼下正在抓紧施工中，每天都有上百名村民在工地务工。“按照工种不同，每天有一百到三百块钱的收入。”王长峰说。

让我们把目光从丰梧村、西溪南村、碧山村收回，复盘乡村与文化的互动过程，从唤醒文化、尊重乡村，再到和衷共济、迸发活力，诸多努力之下，文化赋能乡村的千百种可能愈发清晰。

那么，文化如何赋能乡村？皖南古村给我们的启示是：要通达“古今”，尊重村庄历史文化脉络与村民主体，尊重客观规律、乡村生态，不能偏离乡村搞建设、偏离村民谈发展；要辨明“虚实”，文化作为精神活动，并非虚无缥缈，应充分认识到保留乡村稀缺文化资源的重要性，因地制宜发展文化产业，用好文化人才的力量，文化也能转化成带动一方经济发展的强力引擎；最后，要抵达“幸福”，要看到文化对文明乡风的浸润，留住村民个体记忆，实则是唤醒村民主角意识，也是村民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升的过程。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来源：中国农网 2024 年 9 月 11 日）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农村厅）中国管科院机关及各研究所、中国食药促进会
发：中国食药促进会秘书处及各部门、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郭书田 毛振宾
副 主 编：谢久忠 辛 梅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www.moagov.cn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编 辑：孙正恩 石 卉
邮 编：100125 100810
电 话：010—59195293 66117652
010—66067899 66167899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